

结构演进、诱致失灵与效率补偿

□ 陆江源 张平 袁富华 傅春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38

结构条件变化、诱致机制失灵和效率补偿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时期都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大规模工业化时期诱致机制的失灵将导致效率改进能力下降,需要结构服务化提供补偿,否则经济会陷入转型过程的结构扭曲和震荡,阻碍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城市化路径的达成。

一、结构条件变化与诱致机制失灵

鉴于拉美国家城市化和中国经济转型呈现的诸多问题,我们更加关注后工业化时期的诱致机制失灵问题。如果城市化的发展不能根据已经发生变化的结构条件进行适应性调整,或者这种调整的步伐缓慢,那么,由于诱致机制失灵所导致的问题积累将阻碍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典型化事实 1:结构服务化过程中,投入产出联系下降

这里征引两类指标,对投入产出关联强度随着增长阶段演进而变化的一般趋势给出描述。一类是赫希曼(1991)所谓的诱致强度——部门或产业发展的前后向联系程度,前向联系指的是特定行业对于下游行业的联系强度,后向联系则是特定行业带动上游行业要素投入扩张、生产结构变化的强度。另一类是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消耗系数,包括直接消耗系数——行业或部门在总产出中直接消耗某一特定行业中间投入的比例,以及完全消耗系数——行业通过投入产出网络完全消耗某行业中间投入的比例。

1.赫希曼诱致强度变动趋势的国际比较。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的前向联系普遍发生了比较显著的下降态势,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对于下游产业的推动作用减弱,更大比例的产品被用于满足最终需求。从部门比较角度看,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前后向联系程度普遍低于制造业。典型的情景是,在规模经济效率较为突出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得益于重化工业极大的后向联系,

经济通常能够获得长时期的持续稳定的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重化工业的后向关联程度在2011年平均高达0.8,即1单位的重化工业产出需要0.8单位的其他部门投入,形成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较强牵引。但是,当进入服务业主导的城市化阶段时,相对于重化工业较强的后向联系,作为现代经济支柱的服务业的拉动作用明显较弱。例如,金融业为0.4左右,房地产、信息技术、研发、教育、医疗均在0.4以下,这意味着1单位的现代服务业产出对于上游行业的产出需求不到0.4。这种情景意味着,在结构服务化过程中,随着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较强的一些效率改进诱致环节可能失去。

中国的情景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重化工业化拉动,累积性的规模扩张一直持续到2012年,之后才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从数据估算看,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前向系数普遍高于发达国家,表明经济过程中有更多的产品用于下游产品生产,相比于发达国家具有更强的制造业产业联系;重化工业的后向联系较强,与发达国家一致。这充分体现了工业生产供给主导的经济特征。另一方面,中国服务业的后向联系显著高于发达国家,这是服务业作为工业体系分工结果而被动扩张的表现。转型时期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还未真正进入为制造业提供内生动力的发达阶段,业态层次低、生产效率低的问题,同时也为城市化的可持续带来了障碍。

2.消耗系数变动趋势的国际比较。中国的行业直接消耗系数普遍大于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的制造业直接消耗系数平均在0.02左右,服务业则在0.01左右。而中国的制造业直接消耗系数平均则在0.025左右,服务业的系数也在0.01以上。中国的信息技术、研发和设备租赁等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平均更是高达0.02,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通过完全消耗系数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农业、基础工业、重化工业和消费品制造业等部门

的完全消耗系数都普遍要远高于发达国家,而美国和日本的信息技术、研发、公共管理这些现代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甚至还要高于中国。原因在于,现代服务业普遍具有前后向联系的加总效应,通过前向和后向的网络化联系提升了产业联系的强度,这种联系性不同于工业部门的后向带动机制。

3.基本判断。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主导的过程中,制造业的投入产出联系变弱,且服务业的后向联系明显弱于重化工业,经济整体的投入产出纵向网络联系降低。随着经济结构服务业化的到来,中国的经济结构的诱致机制将发生普遍下降,单靠要素投入驱动、产业选择性政策、非平衡发展等干预资源配置的发展方式也同样越来越不适用。

(二)典型化事实2:结构变动导致技术效率乘数先升后降

在一个投入产出经济中,最终产出增长率可以分解为资本增长、劳动增长、行业TFP的乘数增长效应。当资本增长和劳动增长一定时,行业TFP的提高,将通过投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影响总产出增长率。而技术效率乘数正是衡量经济中投入产出联系强度的理想指标,因为一方面乘数可以进行全行业加总,另一方面又可以细分研究某个特定行业的TFP变动对全行业的影响。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技术效率乘数均出现先上升到下降的过程。发达国家在高度成熟和发达的城市化时期,尽管发生了从工业化向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转换,但是服务业发展仍然带动了投入产出的技术效率乘数的提升。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技术效率乘数提高,1990年达到峰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技术效率乘数下跌趋势,原因有两点:一是由美国和日本技术进步放缓和经济泡沫化所引致;二是制造业外移,破坏了其国内产业链的关联。

从产业类别比较来看,中国的制造业技术效率乘数明显强于欧美日,但服务业与之相反。美国和日本的技术效率乘数从20世纪90年代的2.4下降到了目前的2左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投入产出的技术效率乘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迅速增加,从2.3上升到了2014年的2.62。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重工业化过程,提高了整体经济投入产出的联动效应,具有极强的产出乘数效果,从而维持了那个阶段又高又稳定的经济增长水平。

房地产、计算机信息服务、公共管理、医疗、科学研究这些行业的技术效率乘数测算数值,美国明显高于中国。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是很直观的,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效率促进作用远远低于美国。对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服务业的

低端化也可能成为阶段跨越的瓶颈和阻碍,这一问题在中国新常态下已经越来越突出。

从开放角度来看,发达国家通过全球资源再配置弥补乘数下降。以2014年为例,相对于封闭条件而言,考虑了国际贸易条件的美国和德国的技术效率乘数分别从1.63、1.55提升到1.84、1.59,而中国和韩国的技术效率乘数则分别从2.62、1.80下降到2.24、1.59。封闭和开放条件下的这种差异,源于发达国家有能力通过全球资源再配置来弥补自身投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下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加工制造的低端,还未完成工业产业链的上移,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三)典型化事实3:诱致机制失灵与效率补偿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把转型时期的诱致机制失灵和效率补偿的主要观点归纳为如下判断:经济结构服务化导致了赫希曼诱致机制失灵。工业化生产供给主导转向城市化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过程中,消费和投资的再平衡,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再平衡,导致制造业部分甚至主要的增长和效率改进诱致环节缺失。同时,鉴于服务业前后向联系普遍偏弱的内在特征,最终促使经济网络的关联程度下降。相关趋势和问题是,投入产出的技术效率乘数的明显下降,意味着行业效率提升对于整体经济的网络乘数效应也减弱了。经济结构联系的这种弱化趋势使得赫希曼投资诱致机制变得不再有效,经济发生结构性减速。

中国即将进入诱致机制失灵的阶段,更严重的问题是,服务业的规模化、成本型扩张将加剧失灵所带来的风险。受到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和信息化转型滞后的影响,虽然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赫希曼诱致强度和技术效率乘数都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但是经济结构的服务业化趋势在中国已经显现,同时鉴于中国服务业弱质的现状以及短期内难以彻底扭转这种弱势的前景,诱致机制失灵所带来的冲击将影响未来较长时期的中国城市化和结构服务业化进程。例如,在中国制造业扩张能力开始减弱的转型当口,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先导产业向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转变。2013—2014年中国投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结束了上涨趋势,结构服务业化进程采取了成本扩张型的服务业替代有效率的制造业路径,这种态势若不能得到矫正,必然推动投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迅速下降,造成经济增速的迅速下滑。

诱致机制失灵带来的结构性减速需要进行效率补偿。为了缓解诱致机制失灵引发的增速下降冲击,需要结构服务业化过程的效率补偿机制的塑造。如果服务业增长仍旧以规模化扩张为主,或者在业态高端化方面无所作为,那么城市化将因为无效率的低端服务业的扩张,导致鲍莫尔成本病,迫使城

市化离开发达的现代城市化路径,滑向拉美模式一极。效率补偿的形式有三种:一是通过国际贸易进行资源的全球再配置。随着制造业成本的上升,发达国家普遍将生产过程对外转移。比较典型的是“日本制造”的海外投资布局,“德国制造”的东欧投资布局等。将国内中间品生产环节外包到国外、从国外进口廉价中间品的方式,弥补了国内产业联系和投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下降的缺陷,对于城市化时期的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顶端位置,获取产品附加值收益,是对其国内诱致机制失灵最强大的补偿。二是通过提高国内资源配置效率。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非均衡的赫希曼诱致机制促使经济扭曲不断累积。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转型时期,随着结构条件的变化,经济和社会再平衡将重塑经济过程。此时,资本和劳动如果不能自由地退出原行业、进入新兴行业的话,将进一步加大扭曲,阻碍效率潜力的培育。在城市化时期,发达国家运用高效市场和制度规则纠正扭曲,以此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部分补偿了因为结构性减速带来的产出下降影响。相对而言,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的干预体制,在城市化时期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效率造成了滞后影响:制造业退潮背景下的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转型不力,大量服务业仍旧处于行政垄断、分割之下,资本和劳动难以充分地市场化流动。三是通过研发投入,提高产业的附加值率。为了获取微笑曲线的上端位置,发达国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很高。通过持续的研发提高产业的附加值水平,是发达国家产业阶梯爬升的主要路径。从全球投入产出表来看,中国的产业附加值率只有32%,而美、日、英、法、德等国的附加值率都位于50%左右。

二、中国效率补偿的反事实估计

事实上,歧视性产业政策和规则导致的经济扭曲,在各国增长过程中都存在。为了服务国家目标和发展战略,无论是美国的信息技术规划战略,还是欧洲的保护性产业政策,乃至日本积极协调的市场经济,在经济的各个行业之间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要素价格偏差,这些偏差构成了经济结构的最基本特征。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扭曲具有更加特殊的历史性和结构性。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工农剪刀差的政策,以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非市场化差异的形式,为工业化追赶服务。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剪刀差取消了,但是形形色色的产业补贴政策仍旧作用于价格扭曲。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减弱了中国制造业的扭曲,但是服务业扭曲的体制性原因却很难消除。基于扭曲核算模型,这里提供效率补偿的一种反事实

估计。

(一)中国整体经济扭曲特征:资本扭曲主导

1.中国的整体经济扭曲消除可以带来44%左右的产出增加。根据我们的估算,通过将全部56个行业的要素价格扭曲消除,中国的最终产出可以提高40%~44%左右。然而在2000—2014年,中国的总体扭曲损失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一方面表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未来的要素再配置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这些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如果在10年内进行,每年平均可以得到4%的产出增加;如果分布在20年内进行,则每年可以带来2%左右的产出增加。对于结构性减速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而言,每年2%~4%的GDP增长率增量是十分可观的。

2.劳动要素扭曲的损失下降,资本要素扭曲的损失上升。中国各行业的劳动要素扭曲带来的产出损失水平从2002年开始下降,并从2010年开始迅速显著减少。劳动要素扭曲的产出损失从2000年的18.0%上升到2002年的峰值22.0%后,一直减少到了2014年的10.7%。劳动要素扭曲下降和资本要素扭曲上升相互叠加,导致中国整体扭曲损失并没有多大改善,其机制如下:体制改革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提高了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导致了劳动要素的更优化配置,从而降低了扭曲程度。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资本扭曲损失从2000年的22.8%上升到2014年的33.5%。在这个阶段中国资本日益向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集中,助推了资产泡沫,挤压了制造业实体融资能力。

(二)中国经济扭曲的行业特性:服务业扭曲巨大

1.重化工业时期中国制造业效率不断提升,扭曲程度较弱。我们的估算结果表明,经过多年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中国的制造业扭曲程度已经很低,即使全部消除制造业的要素价格扭曲,也不能带来最终产出显著的增长。这个结论与直观经验相符合,实际上,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目共睹,其投入产出已经形成了完整体系,能够进行大部分环节的工业生产。我们发现,完全消除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的要素价格扭曲,甚至不能带来1%的最终产出增加。

2.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扭曲损失较大。中国的金融、房地产、批发贸易、建筑业的扭曲消除,分别可以带来9.7%、4.6%、4.5%、2.5%的产出增加。现阶段金融和房地产业主导的经济模式,极大扭曲了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扭曲通过投入产出网络,对上下游其他行业产出和效率改进造成挤出。主要判断是,中国的扭曲效率损失主

要存在于服务业部门,尤以金融、批发贸易、房地产业为甚。

3.当前扭曲的服务业很难提供效率补偿。经济结构服务业化导致工业化诱致失灵,只有通过服务业提供效率补偿,才能保持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与工业化不同,城市化是另外一种特殊的生产函数,这个生产函数的本质,体现为有效率的服务业以其提供知识和生产的外溢效应,越来越成为上文所述的制造业和整体经济效率的改进条件。面对效率补偿的要求,中国服务业如果仍旧深陷于管制和扭曲的泥潭,将无法提供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创新动力,现有规模化、成本型的扩张模式,无法使服务业成为真正的城市化增长支柱。

4.国际贸易促进扭曲消除效果。利用国别投入产出和全球投入产出,可以对封闭和开放条件下扭曲消除的不同影响进行甄别。国际贸易促进了可贸易部门的扭曲改进,制造业的扭曲消除可以通过贸易份额的扩大和附加值率提高得以达成。不可贸易部门的扭曲消除也将有很大的益处。尽管金融和建筑业属于不可贸易部门,但是它们的扭曲消除可以带来上游或者下游可贸易制造业的产出扩张,从而带来总体产出的增加。因此,金融、批发贸易、建筑业的扭曲消除分别可以带来12%、7.6%、3.9%的产出增加,远远高于封闭条件。

(三)进一步的评估:经济结构的效率补偿

1.金融业对于其他行业产生了明显挤压作用。消除了金融业的扭曲以后,金融业自身的产出份额将大幅下降,降幅达61.3%(相对下降),而其他行业的产出份额将得到普遍的提升,提升幅度平均为4%左右。事实上,即使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中金融业的比重也是偏高的:2016年中国金融业占比达到8.4%,而同期美国为7.5%,英国为6.6%,日本为4.5%,韩国为5.5%。问题在于,在转型时期中国金融业不仅依靠扭曲的定价占有了较高的产出比重,而且对其他行业产生了挤压。当前受到广泛关注的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的争论,主要集中于金融业扭曲挤压制造业及其后果的评估。由于中国金融业的后向联系很强、前向联系较弱,高昂而扭曲的资金价格抬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使得制造业的利润不断被侵蚀。诱致机制失灵趋势逐渐显著的情况下,金融扭曲的网络效应将加剧宏观风险。现代产业体系应该是产业协同发展、互助互进的关系,而不是这种一个行业挤压其他行业的模式。改革中国的金融业可以使资金效率得到提升,向着均衡的产业体系发展。

2.服务业扭曲削弱投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由于服务业的扭曲挤压了制造业部门的份额,因此也相应地削弱了整体经济的投入产出联系,降低了投

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中国金融业的扭曲存在,使投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下降了0.8%,而房地产业的扭曲则使这种乘数下降了0.35%。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扭曲的消除,分别可以使中国的技术效率乘数从2.62提升到2.64和2.63。

总之,中国现阶段金融和房地产业过度繁荣带来的扭曲,严重阻碍了资源配置优化路径,降低了经济效率。在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过程中,如果放任金融和房地产业对制造业的挤压,将进一步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消费的升级,这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而通过市场化改革消除这些服务业的扭曲,一方面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产出效率,另一方面还可以缓解行业间挤压、提高技术效率乘数,从而缓解结构演进带来的结构性减速。

三、政策建议

第一,将政府职能从工业化驱动转向城市化服务。工业化赶超型的政府对于推动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但是在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化的过程中,却进一步加大了资本和劳动的配置扭曲。要将政府的职能从高速工业化的驱动者转变为高质量城市化服务的提供者。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差异化的政策安排,减少政府背书的公共投资规模,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支出,努力做到公共福利均等化,促进人力资本升级。

第二,针对不同产业制定差别化的改革策略。对制造业而言,只要保持市场化的竞争与开放,即使运用产业政策,中国制造业也存在很强的扭曲纠正能力。但是,对于服务业这类非贸易和垄断部门,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升级。因此对于制造业部门而言,应该继续推动市场竞争和对外开放,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促进制造业自身扭曲的消除,提升制造业部门的产出效率。而对于服务业部门,应该致力于消除行业规制和要素流动的壁垒,降低服务业的垄断收益,减少服务业对制造业部门的挤压作用,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和服务业效率补偿。

第三,推动中国的价值链攀升和全球要素再配置。中国目前还处于国际代工型国家的阶段,全球价值链地位较低。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应该积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产能合作,将部分低附加值产业转移海外,同时保留和开拓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加大链条式创新和分布式创新的力度,努力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攀升。通过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和产能转移,中国才能真正加入以全球要素再配置提升自身经济效率国家的行列。

■ 《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约25000字